

大一统视域下 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进士考论

■郭培贵 杨 涵

永乐迁都不仅迅速提升了北直隶尤其顺天府的人口规模和文化水平,而且显著提高了其科举竞争力,按照“由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并主要在此形成科举竞争力的进士”的确认标准,明代北直隶至少有此类进士791人,是明朝各直省此类进士规模最大的;其经历了洪武至宣德初的准备期、宣德中至正统末的起步期、景泰初至隆庆末的繁荣期和万历初至崇祯末的衰退期的变化;其来源直省呈现出分布广泛而以科举发达直省为主的特点,且因其中有5名祖籍交趾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性。此类进士的为官层次和所任官职十分广泛,有不少人在为官期间做出重要甚至突出贡献。顺天府此类进士共660名,占其进士总数的大半并成为北直隶该类进士的主体;且其在“进士数”“进士阁臣数”和“此类进士入阁数”等方面都居全国首位。而所有这些,都主要是因永乐迁都北京和由此巩固的大一统格局而带来的。

[关键词]大一统;明代;永乐迁都;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进士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5)11-0112-16

郭培贵,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安徽芜湖 241000)

杨涵,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生。(安徽芜湖 241000)

在明代大一统背景下,由外直省移民及其后裔在移入直省考中的进士构成了明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在明代“两直十三布政司”中,因北直隶是京师所在地,该类进士规模最大,构成也最为复杂,影响广泛,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故对其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形成从事明代进土地域分布研究所应遵循的确认进士属地的统一标准,以改变该领域研究众说纷纭的局面^②;而且可以说明永乐迁都对北直隶人口流入的巨大影响,以及外直省移民及其后裔对北直隶特别是京师文化发展和科举实力增强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由于目前学术界尚无专门研究该论题的成果,故本文拟专论之,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确认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应遵循的标准

学术界迄今尚无公认的确认明代进土地域分布应遵循的统一标准,成为明代进土地域分布研究众说纷纭的最主要原因。故在确认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时,首先要做的是,就是

在大一统视域及合理确定明代进土地域分布标准的前提下,确认“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所应遵循的标准,笔者认为该标准的基本内容应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应严格按照明代“进士”的定义,确认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按制度,“进士”是明代科举的最高功名,士子须通过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而获得。未中上述考试或虽中但因作弊而被皇帝褫夺进士功名者,都不是进士。这本不应成为问题,但仍有研究者把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由于考试“迹弊明显”而被嘉靖帝除名的5人(其中翟汝俭、翟汝孝2人皆属北京城内的锦衣卫籍人^[1]卷一九三《翟銮传》,P5111-5112)视作进士,并计入该科进士总数^③;还有把崇祯十三年(1640)不是进士的“赐特用”263人(其中有北直隶籍12人^④)也计入明代进士总数,把崇祯十六年癸未科中会试而“未殿试11人”(其中有“顺天蓟州人”李孔昭^⑤)也计入该科进士总数^⑥。故此有必要首先对什么是明代“进士”做出明确界定。^⑦

其二,应是由其他直省迁入北直隶区划内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的进士。这是笔者主张的应在大一统的视野下,以举行乡试的“两直十三布政司”区划而非“都司”区划作为确认“明代进士省域分布”标准的具体化。^⑧北直隶的区划“东抵山东界,东南抵山东界,南抵河南界,西南抵河南界,西抵山西界,西北抵山西界,北抵沙漠,东北抵辽东界”^[2]卷一五《州县一》,P249。其中所说山东、河南、山西,应分别是指与北直隶接壤的此三省的布政司区界,也即北直隶仅仅与其接壤的此三省的布政司区划为界,而不是与其接壤的此三省的都司区划为界;只有辽东不设布政司,只设都司,才与其都司区划为界。明朝在上述区划内,设有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永平府等8府和隆庆(延庆)、保安2直隶州及其分属116个县^[1]卷四〇《地理一》,P883-902,还设有在京的74卫4千户所、直隶后军都督府的36卫9千户所、大宁都司11卫1千户所、万全都司14卫6千户所,合计135卫20千户所。^⑨必须是由其他直省迁入上述府、州、县及都司卫所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的进士,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而发生于北直隶内部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的进士则不属本文研究范围。在研究明代进土地域分布时,有学者简单地以现今的“河北省”替代明朝的北直隶^⑩;而事实上,明朝北直隶的区划范围不仅包含现今的河北省,还包括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南东北部的安阳、濮阳、鹤壁、新乡等市部分地区以及山东西南部的东明县。故在上述替代下的研究结论肯定是不准确的。

其三,应是或主要是在北直隶区域内形成科举竞争力的进士。这是笔者主张的应以“进士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确认进士属地”原则的具体化,相对以往学界运用较多的单纯依据进士“现籍地”确认其属地的做法,该原则具有以下两个优长之处。

一是与“现籍地”标准不仅不矛盾,还反映了其本质。因进士的“现籍地”与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通常是“形式”与“本质”的关系,故依据后者确认其属地,自然是最为科学的做法。而人们在研究明代进土地域分布时,之所以通常依其“现籍地”确认其属地,首先也是根本的理由就是各地士子通常都要依制在“现籍地”进学和报考科举,故“现籍地”通常也就成为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再加史籍直接记载的通常也是进士的“现籍地”,而非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故依“现籍地”确认进士的属地,既不违其本质,又能“简单易行”,也就成为从事该论题研究的常态。

二是可弥补“现籍地”标准的不足。以上说进士的现籍地“通常”是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也就意味着有时会出现二者不一致的情况,即“现籍地”并非“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在此情况下,如果仍以“现籍地”作为确认其属地的标准,就显然背离了研究进土地域分布是为了弄清“进士科举竞争力的实际形成之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地的科举实力”这一目的,也同时违背了科学研究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准则。而以“进士科举竞争力的形成

或主要形成之地”确认其属地,恰恰可以弥补“现籍地”标准的这一不足。如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科进士唐亮的现籍地为广东琼州府琼山县,但因其自幼即“随父任”而成为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学生员,其科举竞争力主要形成于此,故确认其为浙江进士,显然比确认其为广东进士更为符合实际。^⑪又如永乐十九年辛丑科进士薛瑄的“现籍地”是山西河津县,然而其科举竞争力却主要形成于河南,故确认其为河南进士,显然比确认其为山西进士更为符合实际。^⑫但因薛瑄是明初大儒,又官至阁臣,其为“山西河津人”广为人知,故确认其为河南进士,会让许多熟悉薛瑄的人感到不适。如清初孙奇逢在其《中州人物考》中把薛瑄归为“中州人”,《四库》馆臣就批评其“牵合”。^⑬卷五八《史部十四·传记类二》,P298)但从薛瑄实际的成长经历而言,孙奇逢的做法应更为符合实际。故笔者在此特别申明:对于绝大多数“现籍地”与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一致的进士而言,依其“现籍地”确认其为“某地人”,与依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确认其为“某地进士”,两者是完全重叠而相同的。但对少量“现籍地”与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不一致的进士而言,如上举唐亮、薛瑄,虽依其“现籍地”说其是“某地人”合乎情理,但若判定其为何地进士,就应依其“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做出判断;对此类进士,说其是“某地人”和确认其为“某地进士”,两者具有明显区别。在研究明代进土地域分布时,只有把这种区别揭示出来,才能真实反映各地科举实力的强弱和切实提高研究的精度。

以“应在或主要在北直隶区域内形成科举竞争力”作为确认北直隶进士的标准,对“出生且一直成长在北直隶也拥有北直隶户籍的外直省移民后裔进士”而言,自然没有问题,因其进学过程也即进士竞争力的形成过程就是在北直隶完成的,且构成该类进士的主体;但对少量现籍地被误载,而实际又符合该标准的进士,如宣德五年(1430)进士张暂;正统元年(1436)进士王伟,七年进士程信,十年进士陈咏,十三年进士蒋敷;景泰二年(1451)进士张海、王祥;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姜文;嘉靖十四年进士卢梗,十七年进士白若圭;崇祯十年进士姜应龙、王爗等近50名进士,就须对其进行逐一的严谨考证,以证其当属北直隶进士。^⑭另外,还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形的进士也需要说明。

一是少量并非出生和一直成长于北直隶也没有北直隶户籍的士子,因某种特殊原因移入并进学于北直隶、最终考中顺天府乡试的进士,只要能证明其科举竞争力主要是在北直隶形成的,就应确认其为北直隶进士。此类进士大致有24人,著名者,如成化八年(1472)进士杨一清、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欧钲、弘治三年(1490)进士洪钟等。^⑮再如,成化五年进士王京,该年《登科录》载其为“江西赣州府信丰县官籍,交趾人”^⑯《登科考》《贡举考》《类姓登科考》《碑录》、嘉靖《赣州府志》、天启《赣州府志》、康熙《信丰县志》、雍正《江西通志》也都载其为江西赣州府信丰县(籍)人^⑰,可知其现籍地确为“江西信丰县”。但该年《登科录》又载其中“顺天府乡试第八十四名”,对此,《明英宗实录》道出其缘由:“景泰七年七月辛卯,顺天府通州等处寄籍民王京等奏:‘祖系交趾人,父学右等挈家归附,蒙恩授江西信丰县等处知县等官;臣等自幼读书习举业,今遇顺天府乡试在迩,乞容入试,以图补报。’从之。”^⑱(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卯”,P5687)“寄籍地”不同于“现籍地”,现籍地是户籍正式所在地,而“寄籍地”则指长期居住并取得当地政府认可的户籍地,可知王京的现籍地是“江西信丰县”,寄籍地则是“顺天府通州”,后者是其科举竞争力主要形成之地,故确认其为北直隶进士。

二是个别虽有北直隶户籍,但主要不是在北直隶形成科举竞争力的进士,则依其科举竞争力的主要形成之地确认其属地。如正统四年进士马经,该科《登科录》载其为“直隶河间府景州东光县匠籍”^⑲《会试录》《登科考》《贡举考》《类姓登科考》《碑录》、嘉靖《河间府志》等都载其为北直隶东光县进士^⑳;但该科《登科录》又载马经中“云南乡试第七名”,同科《会试录》载其为“云南曲靖

军民府学生”。对此，弘治礼部侍郎程敏政为马经及其妻徐氏所写合葬墓志铭道出了缘由：“君讳经，字用常，世居河间东光…处士闻如之子…处士尝被诖误谪云南六凉，君侍行，遂入曲靖学为诸生，不三年，领宣德壬子（七年）云南乡荐，正统己未（四年）举进士……太孺人姓徐氏，上元人，父仲华亦以事谪云南，与处士同患难而相得，知君必亢宗，故以太孺人归焉。”^[7]（卷四三《湖广宜章知县赠文林郎马君经太孺人徐氏合葬墓志铭》，P52）可见马经到云南六凉，是因侍奉其被贬至此的父亲，他在此迎娶其父结交的谪友徐仲华之女为妻，并就近“入曲靖学为诸生”，且考中宣德七年壬子科云南乡试；到正统四年中会试，其身份仍为“云南曲靖军民府学生”，可知其科举竞争力主要形成于云南，当属云南进士。故景泰《寰宇通志》在载其为“直隶河间府东光县”人的同时，又载其为“云南曲靖军民府陆凉州”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天启《滇志》、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都载其为云南曲靖军民府陆凉州人，《隆庆云南通志》载其为“陆凉卫人”。^⑩又如，万历二年（1574）进士刘弘道为“太医院医籍，直隶苏州府吴县人”^{[8][P47]}。依此，刘弘道应为北直隶进士，但该科《会试录》《登科录》分别载其以“吴县学附学生”中该科会试和进士，《南国贤书》载其以“吴县学附学生”中万历年应天府乡试；《贡举考》《类姓登科考》、崇祯《吴县志》、康熙《吴县志》也都载刘弘道为南直隶吴县进士^⑪，而万历《顺天府志》、康熙《畿辅通志》、雍正《畿辅通志》所载万历二年进士名单都无刘弘道^⑫，由上可知南直隶吴县应是刘弘道科举竞争力的主要形成之地，可确认其为南直隶进士。

三是部分士子虽以“锦衣卫官籍”考中顺天府乡试，但经考证，可知其“锦衣卫官籍”系攀附权贵而得，其科举竞争力也并非主要形成于北直隶，而是主要形成于其原籍地，则仍确认其为原籍地进士。如嘉靖二十年进士陆杲、二十六年进士陆光祖、三十五年进士陆梦韩就皆属此类，3人虽都被相应科次《登科录》载为“锦衣卫官籍，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人”，但因该籍系钻营而得，其科举竞争力都主要形成于浙江，故被确认为浙江进士。^⑬

四是拥有北直隶户籍但考中外省乡试的进士，因史料限制，不能直接证明其科举竞争力形成或主要形成于何地，则依据“其本人和同科进士对其属地的认定”确认其属地。如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王之采以“锦衣卫官籍”中山西乡试，但其本人和同科进士都确认其为顺天府进士，故本文也确认其为北直隶进士。而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杨世芳、张辇虽也以“锦衣卫官籍”中山西乡试，但其本人和同科进士都认为其为山西进士，有关史籍也一致如此记载，本文则确认其为山西进士。^⑭

五是现籍地不属北直隶的北京国子监生考中进士，则各依其现籍地确认其属地。其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因袭明朝成例，对此类进士都是依据其现籍地确认其属地。^⑮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其总体而言，不属北直隶籍的北京国子监生考中进士的竞争力主要形成于其现籍地，而不是北直隶。^⑯故各依其现籍地确认其属地。

综上所述，必须是由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并在或主要在北直隶形成科举竞争力的进士，才被确认为“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也即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规模、时空分布及层级特点

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规模居明代各直省同类进士之冠，在时空分布和层级构成上也都表现出显著特点。

（一）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规模

依照“确认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应遵循的标准”，在全面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北直隶进士数和“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数”进行逐科逐人的确认，且对部分

进士的“科举竞争力是否形成或主要形成于北直隶”进行审慎考证,笔者得出了“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又据该表统计而形成表1所示数据:

由表1统计数据可知,明代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的规模共达791人²⁰,占北直隶进士总数(2434人)的32.50%。在明代“两直十三布政司”加辽东共16个省域进士群体中,北直隶的该类进士占比虽非最高²¹,但规模绝对是最大的,接近明代广东布政司的进士总数²²,远超云南、贵州、广西、辽东4省域进士的总和²³。

表1 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表中以★代表)分科数量统计

科次	北直隶进士数	★数	★占比%	科次	北直隶进士数	★数	★占比%	科次	北直隶进士数	★数	★占比%
洪武四年 辛亥科	6	0	0	成化八年 壬辰科	30	10	33.33	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科	47	17	36.17
洪武十八年 乙丑科	25	0	0	成化十一年 乙未科	39	14	35.9	嘉靖四十四年 乙丑科	36	5	13.89
洪武二十一年 戊辰科	2	0	0	成化十四年 戊戌科	50	19	38	隆庆二年 戊辰科	37	12	32.43
洪武二十四年 辛未科	2	0	0	成化十七年 辛丑科	33	12	36.36	隆庆五年 辛未科	36	16	44.44
洪武二十七年 甲戌科	1	0	0	成化二十年 甲辰科	41	16	39.02	万历二年 甲戌科	29	7	24.14
洪武三十年 春榜	13	0	0	成化二十三年 丁未科	44	16	36.36	万历五年 丁丑科	29	6	20.69
建文二年 庚辰科	1	0	0	弘治三年 庚戌科	42	17	40.48	万历八年 庚辰科	27	4	14.81
永乐二年 甲申科	0	0	0	弘治六年 癸丑科	48	15	31.25	万历十一年 癸未科	32	11	34.38
永乐四年 丙戌科	3	0	0	弘治九年 丙辰科	41	22	53.66	万历十四年 丙戌科	35	9	25.71
永乐九年 辛卯科	1	0	0	弘治十二年 己未科	53	18	33.96	万历十七年 己丑科	37	5	13.51
永乐十年 壬辰科	0	0	0	弘治十五年 壬戌科	47	26	55.32	万历二十年 壬辰科	24	4	16.67
永乐十三年 乙未科	6	0	0	弘治十八年 乙丑科	45	18	40	万历二十三年 乙未科	16	4	25
永乐十六年 戊戌科	10	0	0	正德三年 戊辰科	52	21	40.38	万历二十六年 戊戌科	19	3	15.79
永乐十九年 辛丑科	9	0	0	正德六年 辛未科	42	22	52.38	万历二十九年 辛丑科	18	5	27.78
永乐二十二年 甲辰科	6	0	0	正德九年 甲戌科	42	16	38.1	万历三十二年 甲辰科	27	2	7.41
宣德二年 丁未科	8	0	0	正德十二年 丁丑科	40	15	37.5	万历三十五年 丁未科	19	1	5.26
宣德五年 庚戌科	6	3	50	正德十六年 辛巳科	49	18	36.73	万历三十八年 庚戌科	18	4	22.22

续表1

科次	北直隶进士数	★数	★占比%	科次	北直隶进士数	★数	★占比%	科次	北直隶进士数	★数	★占比%
宣德八年癸丑科	13	5	38.46	嘉靖二年癸未科	50	20	40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	29	6	20.69
正统元年丙辰科	8	3	37.5	嘉靖五年丙戌科	30	12	40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	26	6	23.08
正统四年己未科	9	3	33.33	嘉靖八年己丑科	34	12	35.29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	24	3	12.5
正统七年壬戌科	19	5	26.32	嘉靖十一年壬辰科	41	14	34.15	天启二年壬戌科	35	6	17.14
正统十年乙丑科	17	6	35.29	嘉靖十四年乙未科	23	9	39.13	天启五年乙丑科	15	1	6.67
正统十三年戊辰科	19	9	47.37	嘉靖十七年戊戌科	36	12	33.33	崇祯元年戊辰科	27	9	33.33
景泰二年辛未科	24	15	62.5	嘉靖二十年辛丑科	31	11	33.33	崇祯四年辛未科	22	9	40.91
景泰五年甲戌科	51	23	45.1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	30	10	33.33	崇祯七年甲戌科	13	7	53.85
天顺元年丁丑科	47	11	23.4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	33	9	27.27	崇祯十年丁丑科	32	8	25
天顺四年庚辰科	23	6	26.09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	46	16	34.78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	25	7	28
天顺八年甲申科	47	23	48.94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	50	15	30	崇祯十六年癸未科	32	10	31.25
成化二年丙戌科	52	22	42.31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	34	9	26.47	合计:共88科,北直隶进士共2434人,其中从外省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791人,占总数的32.50%			
成化五年己丑科	25	11	44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	39	15	38.46				

(二)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时段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由表1所示数据可知,北直隶该类进士因时代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时段分布特点。

其一,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至宣德二年丁未科是准备期,该期16科殿试,由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没有考中进士者。^②其主要成因是北直隶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相对南方本来就处于落后地位,元末明初和“靖难之役”时又遭受严重的战乱摧残,故此期经济和人口都处于减少、凋敝和恢复时期;永乐十九年正月,明朝虽正式迁都北京,由此迁来了大量的朝廷官员和军卫官兵,但其家属子弟是逐渐迁入,且迁入后还有一个安家和适应环境的过程,在永乐朝万事倥偬的情况下,能够专心进学和备考科举者还很少,故北直隶在该期总共才考中进士93人,仅占明朝同期录取进士总数(2972人)的3.13%;由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者更是空白。

其二,宣德五年庚戌科至正统十三年戊辰科是起步期。该期7科殿试,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共考出34名进士,仅占明代北直隶此类进士总数的4.3%,科均4.86人,故称“起步期”。这一是

得益于明朝迁都北京后,大批京官子弟逐渐从南京迁至北京及附近地区进学和备考科举。如王玉为“山东东昌府高唐州武城县军籍”,因其父任工部官而成为易州学生员,既而中顺天府乡试、会试,最终中宣德五年进士。^{[9](P18)}又如宋怀为“江西吉安府吉水县民籍”,因其父在北京任“越府右长史”而成为顺天府“通州学生”,并考中顺天府乡试,继中宣德八年进士。^{[10](P22)}二是为承应北京各官府的诸种需要,从南方省份迁徙大量“富户”、工匠入籍北京。如永乐初,本为“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的章绘家被“取富民实北京”,为大兴县富户籍;永乐二十二年,其父因疾卒于京师,绘“方九岁”,其伯父招其至京,“授室”并“延师诲之”;最终,其以“大兴县儒士”中正统三年顺天府乡试,连中次年进士。^②三是为保卫京师,而从南方调入大量军人及其家属驻守北京及周边地区,成为外直省人迁入北直隶后参加科举的重要来源。四是为保卫北边安全,设立宣府镇、蓟镇等军镇卫所,迁入这里的外直省移民及其后裔也成为北直隶进士的重要来源。五是明廷于宣德元年开始对乡试实行定额取士制度,在解额上给了北直隶乡试明显照顾;次年会试,又开始实行分南北卷按比例录取制度,相比于其科举实力,北直隶所属北卷区得到了明显的录取比例优惠。

其三,景泰二年辛未科至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是繁荣期,该期持续120年,举行了41科殿试,北直隶共考出此类进士620人,科均飙升至15.12人,是起步期的3.11倍,占明代北直隶此类进士总数的78.38%,高出同期北直隶进士在明代北直隶进士总数占比(67.38%)11个百分点,占明代北直隶同期进士总数的37.80%。以上数据都说明北直隶此间进入了产出该类进士的繁荣期。这是在明朝社会同期总体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大背景下,永乐迁都为顺天府及北直隶带来的所有有利条件得以充分发挥和全面开花的结果;更是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充分利用北直隶有利的竞取科名条件的结果。

其四,万历二年甲戌科至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是衰退期,该期24科殿试,北直隶共产生此类进士137人,科均5.71人,不到繁荣期的四成;此间该类进士仅占同期北直隶进士总数(610人)的22.46%,比繁荣期下降了15.34个百分点;占明代北直隶此类进士总数的17.32%,低于同期北直隶进士在明代北直隶进士总数中占比(25.06%)7.74个百分点,以上数据都说明北直隶此间进入了产出该类进士的衰退期。其成因应主要有二:一是此间明廷党争激烈、天启阉党专权,尤其是明朝与后金(清朝)及农民军政权在北直隶等地长期交战,导致百姓生计普遍凋敝,科举环境日益恶化。二是此间北直隶考取进士数明显下降,由繁荣期的科均40人,下降到此间的科均25.42人,几乎腰斩。在这样的背景下,“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科均考取数呈断崖式下降也自在情理之中。

(三)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

据《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统计,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在北直隶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顺天府有该类进士660人,分别占了其自身进士总数(1062人)和北直隶该类进士总数(791人)的62.15%和83.44%,也就是说顺天府该类进士占了顺天府进士的一大半并成为北直隶该类进士的主体;自洪武四年辛亥至永乐十六年戊戌共14科殿试,顺天府考中进士共17人,仅占明代该府进士总数的1.6%,科均1.21人;而自永乐十九年辛丑迁都至崇祯十六年癸未共74科殿试,顺天府考中进士共1045人,占明代该府进士总数98.4%,科均飙升至14.12人。以上变化都说明,明朝迁都北京不仅为这里带来了大量移民及丰富资源,而且促进了外来移民及其后裔与本土土人的交流融合,从而带来了顺天府文化水平和考中进士数的显著提升,表现了国家政治中心迁至北京后对其科举实力上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靠近北边和顺天府周围的万全都司、延庆州、保安州、永平府、河间府、保定府共有该类

进士98名,占了北直隶该类进士的12.39%,占比仅次于顺天府。其中万全都司该类进士占其进士总数的66.67%,超过顺天府同类进士占比4.52个百分点。尽管在永乐以前,明廷就已采取了防御蒙古南下的卫所布局,但迁都北京后,这些地区无疑又增加了拱卫京师安全的职能,并随之增设了相应的军卫机构,如驻河间府的河间卫、沈阳中屯卫、大同中屯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等俱于永乐中建^{[11](卷二《河间府·公署》,P40下)},驻保定府的大宁都司及所属保定左卫、保定右卫、保定中卫、保定前卫、保定后卫也都是永乐初改建于此^{[11](卷二《保定府·公署》,P30下)}。

三是地处北直隶南部的真定、顺德、广平、大名4府有该类进士33人,占明代北直隶该类进士总数的4.17%。这个占比应大致符合明代内地省际人口迁徙的一般情况,而与迁都关系不大。

(四)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层级特点

明代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层级也表现出自身特点。明代一、二、三甲进士总数分别为267人、6469人和17850人,各占明代进士总数之比为1.09%、26.31%和72.60%,构成一个上尖下宽的三角塔状。而据《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统计,明代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的一、二、三甲进士则分别为9人、241人和541人,各占该类进士总数的1.14%、30.47%和68.39%,也是一个上尖下宽的三角塔状,但其一、二甲进士占该类进士的比例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明朝各类庶吉士已知为1421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24319名)的5.84%,而明代北直隶该类进士中的庶吉士为53人,占其二、三甲进士总数(782人)的比例则为6.78%,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皆说明明代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科举竞争力也即文化素养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三、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原直省分布

明代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原直省分布也呈现出鲜明特点,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一统格局下明廷迁都的需要及各直省为适应这一需要而发生的人口迁徙状况,又反映了明代迁都北京是皇权调动全国资源予以支撑的结果。表2所示统计数据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表2可知,迁入北直隶特别是顺天府的移民及其后裔进士,其原直省分布表现出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来源十分广泛。该类进士分别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四川、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等11个直省及辽东地区,如果不局限于考中进士者,而就所有来自外直省的移民及其后裔而言,那么其来源一定更为广泛而具有全国性;因其中还有5名祖籍交趾的移民后裔进士,又使其来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性。这一特点,不仅促成了北直隶特别是京师来自不同地区人口(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并在交融中提高了北直隶特别是京师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包容性和代表性,而且对提高京师面向全国的凝聚力、影响力及辐射力,巩固大一统,都有积极意义。

二是以科举发达直省的移民及其后裔进士为主。科举发达的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合计为476人,占北直隶同类进士总数的60.18%;其中尤以南直隶和浙江最为突出,二者合计为407人,占比51.45%,也即超过了北直隶同类进士的半数;这既得益于南直隶和浙江是迁都北京移民最多的直省,除大量的京官和卫所军兵外,还有富户、医籍、匠籍等人家户也主要来自南直隶和浙江,更得益于他们来自科举发达地区,具有强劲的科举竞争实力,又长期与原籍地家族及社会保持联系,故在科举竞争中长期保持优势,并对提高北直隶特别是京师地区的文化水准和科举实力发挥了重大积极影响。

表2 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原属直省分布

原属直省 北直隶府州及 实土都司	南直 隶人 数	浙江 人 数	江西 人 数	福建 人 数	湖广 人 数	广东 人 数	山西 人 数	陕西 人 数	山东 人 数	河南 人 数	四川 人 数	辽东 人 数	交趾 人 数	合计
顺天府	198	176	53	25	26	8	58	20	61	24	6	1	4	660
河间府	9	3	3	0	2	2	11	0	3	3	1	0	0	37
永平府	4	2	5	1	4	0	9	0	3	0	1	0	0	29
保定府	1	0	2	0	3	0	2	1	3	1	0	0	0	13
万全都司	5	0	1	0	2	0	3	0	2	1	0	0	0	14
延庆州	1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保安州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真定府	4	1	3	0	0	0	7	0	0	2	0	0	0	17
顺德府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2
大名府	1	0	1	0	0	0	6	1	2	1	0	0	1	13
广平府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合计	223	184	69	26	38	10	98	22	74	33	8	1	5	791
占比%	28.19	23.26	8.72	3.29	4.80	1.26	12.39	2.78	9.36	4.17	1.01	0.13	0.63	100

注:本表依据《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统计制作。

三是来自邻近省份的移民及其后裔进士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紧邻的山西、山东、河南三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共205人,占了该类进士总数的25.92%;尤其是山西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者达98人,占北直隶该类进士总数的12.39%,仅次于南直隶和浙江而位居第三,且在北直隶分布之广也超过了所有直省的移民,这与洪武特别是永乐时期大规模的山西移民广泛分布于北直隶各地具有直接关系。

四、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历史贡献

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进士作为全国科举竞争中的胜出者,最好的出路当然是当官,通过担任各种官职发挥其应有的行政作用,这既是每个进士实现自身价值的通常之路,也是朝廷通过科举选才和吏部任官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同时也是科举的重要魅力所在。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进士除12人“未任职”和15人因史料缺失而“不详”其是否任官外,764人的“官至”(所任最高官职)状况,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后的“官至”状况表现出突出的广泛性:一是其“官至”层级的广泛性,从阁臣(最高正一品)到行人(正八品)、从京官到地方官(知县正七品);官至七品以上者756人,占已知“官至”官员总数近99%;官至五品以上者569名,占已知“官至”官员总数的74%,说明其几乎都能官至中高级官员和大部分进士都能官至高级官员。二是担任不同官职的广泛性,仅表3涉及的“官至”官职就近70种,若考虑到其历任官职就更加广泛,说明

大一统视域下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进士考论

表3 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官至统计表

时期 ^①	★数 ^③	阁臣 ^②	从一品 ^④	正二品 ^④	从二品 ^⑤	正三品 ^⑥	从三品 ^⑥	正四品 ^⑥	从四品 ^⑥	正五品 ^⑥	从五品 ^⑥	正六品 ^⑦	从六品 ^⑦	正七品 ^⑦	从七品 ^⑦	正八品 ^⑦	未任职	不详
洪武(31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建文(4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永乐(22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宣德(10年)	8	1	0	0	0	1	0	2	0	1	0	1	0	1	1	0	0	0
正统(14年)	26	0	0	2	3	4	2	2	2	5	1	2	1	1	0	1	0	0
景泰(7年)	38	0	0	2	1	3	6	7	2	7	0	3	0	3	2	1	0	1
天顺(8年)	40	1	1	2	2	2	2	8	3	6	0	6	0	5	0	1	1	0
成化(23年)	120	2	2	2	6	10	8	25	3	19	3	13	0	16	1	2	0	8
弘治(18年)	116	1	0	3	1	16	13	21	4	21	8	5	1	18	1	1	1	1
正德(16年)	92	0	0	2	1	8	3	28	1	16	7	6	0	17	0	0	1	2
嘉靖(45年)	186	0	0	4	6	16	16	56	10	32	5	21	0	16	0	1	2	1
隆庆(6年)	28	0	0	0	1	3	4	12	1	5	1	0	0	1	0	0	0	0
万历(48年)	80	2	3	3	5	9	6	16	4	9	0	5	0	13	3	1	0	1
天启(7年)	7	0	0	0	0	1	0	1	0	1	1	1	0	1	1	0	0	0
崇祯(16年)	50	1	0	1	1	1	6	1	6	3	2	0	18	1	0	7	1	
合计	791	8	6	21	27	74	61	184	31	128	29	65	2	110	10	8	12	15

注:本表依据拙著《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与《明实录》《明会典》、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张廷玉《明史》，以及各直省《通志》和府、州、县《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制作。

进士的仕途空间十分宽广。三是担任地方官者任职地域的广泛性,如表3中“从二品”布政使共27人,包含福建、河南、山东、云南、山西、四川、贵州、浙江、陕西、江西等10省的左、右布政使;正四品按察副使67人遍及13省,知府81人遍及两直隶十三布政司。^⑭

另外,不少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为官期间做出了重要甚至突出贡献,如著名阁臣李东阳。弘治时,“与首辅刘健等竭心献纳,时政阙失,必尽言极谏”。正德初,“凡(刘)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此庇”。其“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1](卷一八一《李东阳传》,P4822,P4824,P4825)}

又如杨一清,“博学”而通达时政,“善权变”而“性阔大”。正德时两任总制陕西军务,“尤晓畅边事,羽书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机宜”,为维护西北边地安宁做出突出贡献。在助太监张永除掉刘瑾后,继任吏部尚书,“凡为瑾所构陷者,率见甄录;朝有所知,夕即登荐”,“人或訾已,反荐扬之”,表现出杰出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超人见识。正德十年以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次年,受幸臣钱宁排挤而去位。嘉靖三年,诏以少傅、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成为明朝历史上首位以“故相行边”的大臣,“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后又以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累官至特进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其才一时无两,或比之(唐代名相)姚崇云”。^{[1](卷一九八《杨一清传》,P5228,P5229,P5231)}

再如景泰时徐有贞,运河决堤于山东寿张县沙湾,“前后治者皆无功,廷臣共举有贞,乃擢左金都御史治之”。有贞“大集民夫,躬亲督率”,开广济渠、增水疏通运河,并建闸筑堰、置水门,“水患悉平”。^{[1](卷一七一《徐有贞传》,P4561,P4562)}成化时,兵部尚书程信“有才力,识大体”,平定四川戎县反叛。^{[1](卷一七二《程信传》,P4594,P4595)}都御史韩雍判断军情“动中事机,临战,率躬亲矢石,不目瞬”,平定广西叛乱。^{[1](卷一七八《韩雍传》,P4735)}兵部侍郎阮勤,“本交趾人”,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筑墩台14所,治垣堑30余里,“岁饥,奏免七府租四十余万石……蛮邦人著声中国者,勤为最”。^{[1](卷一七八《余子俊传附阮勤传》,P4740)}弘治时,倪岳“文章敏捷,博综经世之务”,风采严峻,善断大事,“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1](卷一八三《倪岳传》,P4864)}工部尚书曾鑒累奏停减上供珍品和元夕烟火,以苏民困。^{[1](卷一八五《曾鑒传》,P4901)}嘉靖初,吏部尚书乔宇“自为选郎,有人伦鉴,及是铨政一清……凡为权幸所黜者,毕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1](卷一九四《乔宇传》,P5132)}嘉靖中,宣大总督翟鹏“性刚介,历官以清操闻”,“浚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省仓储无算”。^{[1](卷二〇四《翟鹏传》,P5382)}万历中,右金都御史李三才总督漕运和巡抚凤阳诸府,“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及淮、徐岁侵,又请振恤,蠲马价;淮人深德之”。^{[1](卷二三二《李三才传》,P6064,P6065)}天启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国祚“素行清慎,事持大体,称长者”。^{[1](卷二四〇《朱国祚传》,P6250)}南明弘光政权时期史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叙江北战功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擒剧盗程继孔功加太傅,皆力辞,不允”。其“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篷,冬不裘,寝不解衣”。最终,守扬州,城破被杀,为南明弘光政权忠正殉国大臣的杰出代表。^{[1](卷二七四《史可法传》,P7023)}此类例子,不一而足。

当然,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为官者也有败类。如天启时崔呈秀“卑污狡狯”,赃私狼藉;投靠魏忠贤,“乞为养子”,“嗜利弥甚,朝士多拜为门下士,以通于忠贤。其不附已及势位相轧者,辄使其党排去之,时有‘五虎’之目,以呈秀为魁。诸所倾陷,不可悉数”。^{[1](卷三〇六《崔呈秀传》,P7848,P7849)}但败类终究为极少数,该进士群体的绝大部分为官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结语

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早在秦汉就已形成,此后不断强化;而明朝永乐迁都北京无疑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局面^⑧。故研究明代的省际移民及其后裔进士或某地域的进士分布,自然也应具有大一统的视野,依照合理统一的标准和确凿严谨的史料考证确认每一进士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并以此作为确认其属地的依据。只有如此,才可能准确反映各地域的科举实力,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如果在考察进士地域分布时,没有这一宏观视野和严谨求真的态度,不考虑客观存在的主要由“移民及其后裔”因素造成的史籍对进士属地的重复记载,由编纂者疏忽等原因造成的漏载、误载,以及进士的现籍地与其科举竞争力的实际形成之地不一致等情况,而仅凭史籍所载的某地域进士名单进行统计,那就一定会使这一研究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永乐迁都北京不仅显著巩固了大一统格局,而且对北直隶特别是京师顺天府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一是迅速提升了顺天府的人口规模。据曹树基估算,永乐年间,从全国各地迁入北京城和顺天府的“各类人口总计有130万”^{[12](P331)}。二是极大提高了顺天府特别是北京人口的文化水平。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特别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各类人口在此持续进行了多元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不仅显著提高了北京地区的文化内涵与水平,也显著提高了都城北京对全国的影响力及辐射力。三是由于上述两个变化,极大提高了北直隶尤其顺天府的科举实力,不仅使北直隶的进士排名从洪武至永乐时期的全国第10名提升到宣德至崇祯间的全国第3名,仅次于南直隶和浙江,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最大规模的“外直省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群体;自正统至明末,北直隶还产生了23名进士阁臣,数量仅次于南直隶(26名)。京师顺天府在以下三方面都居全国首位:其一进士总数达1062名,为明代进士最多的一府^⑨;其二产生了10名进士阁臣^⑩,位列全国第一,分别比公认科举最为发达的江西吉安府、南直隶苏州府、浙江绍兴府多出1名、2名和4名;其三在10名进士阁臣中,有8名都属于“外直省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更是遥遥领先于全国各府乃至各直、省同类情况。所有这些成果,应都是由迁都北京和由此巩固的大一统格局带来的。

注释:

①学术界最早专门研究明代移民及其后裔进士的是独立学者沈登苗,其代表性成果为《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26页),该文首次提出了“双籍进士”的概念,即“将这些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这无疑促进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不过,“双籍进士”的表述尚有再斟酌的余地,因其极易让人理解为“有两个户籍的进士”,但这既在制度上不可能,在实际上也十分罕见,即使存在也不合法,因而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进行这样的“籍贯登记”。另外,该表述实际上也没有准确表达沈氏自己所要表达的原意,因其认为“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而“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细酌其意,其“双籍进士”的落脚点都在“户籍所在地”上,本意应是指文献中有“户籍现所在地”和“户籍原所在地”记载的进士,“双籍”中“籍”字的确切含义应是“户籍地”,而非“户籍”,是“双户籍地”(现籍地和原籍地),而非“双户籍”;因“户籍”和“户口所在地”在含义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另外,沈氏所说的“双籍进士”包含了省域间和省域内迁移的两类进士,据其统计,明代“河北”(按,此表述也不准确,当为“北直隶”,因明代没有名为“河北”的一级地方行政机

构设置)有省内外移民及其后裔进士794名;而笔者统计明代仅其他直省迁入北直隶的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的就已达791名,并为明其来历,还制有包含每位进士姓名、科甲名次、现籍地和原籍地、中举地及其出处和考证的具体名单,因其篇幅巨大,而版面有限,故在此只好省略,但可详见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拙著《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的相关考证。

②概括而言,学界发表相关论文至少近百篇,包含明代进士总数及分省进士数的统计至少已有数十种,其中最有代表性且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以明代进士的“著籍地”(也即“现籍地”)为依据,不仅对明代进士总数以及“两直十三布政司”和辽东的进士数进行了逐科统计,而且对其下属的府、州、县及辖区内卫所的进士数也进行了统计,是学界论及明代进士地域分布问题时经常引用的成果。但该书也有明显不足:一是对“进士”的定义把握不准,故把不是“进士”者也纳入了统计范围。二是对进士属地的考证不足。三是“地域”概念不清,突出表现在布政司辖区和都司辖区不分,如把驻地在南直隶凤阳府颍州境内的颍川卫列入“河南布政司各府进士分布表”内,把驻地在四川夔州府境内的瞿塘卫列入“湖广布政司各府进士分布表”内(第72、73页)。以上不足自然降低了其统计结果的准确度。故迄今关于明代进士地域分布的研究仍表现为“众说纷纭”的状态,总体尚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

③详见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④详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58页)。

⑤《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上海图书馆藏本)。

⑥详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54页)。

⑦对明代各科进士数及明代进士总数的考证,请详见拙著《明代学校科举及任官制度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0—432页)。

⑧明代直接管辖且实行科举的区域,除“两直十三布政司”外,还有辽东地区,这里不举行乡试,其士子按规定先后附试山东乡试和顺天府乡试;因其不设布政司,而只设都司卫所系统进行统治,故可视作与“两直十三布政司”平行的一个省域特区。

⑨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四《兵部七·都司卫所》(《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246—261页)。另,该书载万全都司共辖有15卫、7千户所,但因其中蔚州卫和广昌千户所分别在山西布政司大同府所辖的蔚州和广昌县境内,而不在北直隶境内,故此只计为14卫6千户所。

⑩详见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⑪《登科考》(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鶴鸣馆刊本,卷三,第44页)、《贡举考》(《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第229页)、《类姓登科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6册,第475页)、《碑录》(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清刊本,第155页)载唐亮(又作“唐宽”)中永乐十六年戊戌科三甲进士,为广东琼州府琼山县人,但万历《琼州府志》卷一〇《人物志·乡科》(万历刻本)、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三四《选举十二·明举人》又载唐亮中永乐十五年丁酉科浙江乡试。这是为何呢?正德十六年广东进士黄佐为唐亮之父舟所撰专《传》中道出了缘由:“唐舟,字汝济,琼山人……甲申举进士……以微累降判衢郡……子亮,字景明,幼随父任衢州,游常山学,中永乐丁酉科浙江乡试,戊戌登进士”([明]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卷六五《监察御史唐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28册,第556页)。《万历野获编》卷一六《科场·两中乡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2页)、《咸丰琼山县志》卷一九《人物志一·乡贤·明》(咸丰七年刊本,第774页)皆有同载。《康熙常山县志》卷一〇《选举表·明进

士》(康熙二十二年钞本,第209页)、《雍正常山县志》卷七《选举志》(雍正二年刊本,第178页)也都载唐亮为常山县城“前坊人”。可知唐亮自幼“随父任”到浙江衢州府,成为常山县学生员,其科举竞争力主要形成于此,故当为浙江进士。

⑫景泰《寰宇通志》(朝华出版社2020年影印景泰内府刻本第7册,第454页)、《明宪宗实录》(第208页)、《明一统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5册,第213页)、《殿阁词林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第177页)、万历《山西通志》卷二二《选举中·平阳府·国朝进士》(万历刊本)、《贡举考》(第231页)、《类姓登科考》(第694页)等文献皆载薛瑄为山西河津县人。但正德《国朝河南举人名录》(宁波出版社2010年影印天一阁藏本,第2册第8页)又载薛瑄以河南“鄢陵县学生”中永乐十八年庚子科河南乡试解元。这是为何?对此,天顺阁臣李贤为瑄所撰《神道碑铭》载其“世为山西河津县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生公……童时教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贞为(河南)荥阳教谕,公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既而闻魏、范二老先生深于理学,乃礼延于家,供子弟职……永乐己亥(十七年),贞改河南鄢陵,时教官考绩以科贡多寡为黜陟,贞大以为忧。公乃补鄢陵诸生,遂中河南乡试第一,明年登进士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614–615页)。黄宗羲撰《文清薛敬轩先生瑄》也载“薛瑄……自幼书史过目成诵,父贞为荥阳教谕,闻魏、范二先生深于理学(魏纯,字希文,山东高密人;范俟考),俾先生与之游处,讲习濂洛诸书……父移教鄢陵,先生补鄢陵诸生,中河南永乐庚子乡试第一,明年登进士第”(《明儒学案》卷一《河东学案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7册,第15页)。沈佳《明儒言行录》卷二《薛瑄敬轩先生文清公》亦有同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621页)。由上可知,薛瑄12岁时,就已随父在河南进学,并最终以“鄢陵诸生”考中河南解元,其科举竞争力应主要形成于河南,当属河南进士。因此,嘉靖《河南通志》卷四五《科目》(嘉靖刊本)、万历《开封府志》卷一二《科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6册,第579页)皆载薛瑄为河南鄢陵县人,雍正《河南通志》卷四五《选举二·进士》载其为“鄢陵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6册,第570页),且雍正《平阳府志》卷二一《选举上·进士》收录的永乐十九年进士名单亦未载薛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44册,第431页)。

⑬笔者对这近50名进士在北直隶或主要在北直隶形成科举竞争力的情况都做了翔实的考证,但因考证篇幅过大,此处版面有限,只得省略;请详见《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的相关考证。

⑭杨一清、欧钲、洪钟都是以“奇童”被荐为“翰林院秀才”,在北京翰林院进学,其科举竞争力主要形成于北京,故被确认为北直隶进士。此24人科举竞争力主要形成于北直隶的考证,请详见《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

⑮《登科考》(卷八,第15页)、《贡举考》(第303页)、《类姓登科考》(第484页)、《碑录》(第651页)、嘉靖《赣州府志》卷九《选举·进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50册,第3页)、天启《赣州府志》卷一五《选举志·进士》(天启刊本)、康熙《信丰县志》卷七《选举·进士·明》(《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江西》第296号,第3页)、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三《选举五·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4册,第737页)。

⑯《正统四年会试录》(宁波出版社2007年影印天一阁藏本,第4页)、《登科考》(卷五,第6页)、《贡举考》(第252页)、《类姓登科考》(第633页)、《碑录》(第203页)、《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六《国朝进士》(《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河北》第134号)。

⑰(明)陈循等编《寰宇通志》卷二《河间府·科甲》(朝华出版社2020年影印明内府刻本,第1册,第194页)、卷一一二《曲靖军民府·科甲》(第10册,第310–311页),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

《曲靖军民府·科甲》(《续修四库全书》第681册,第44页),天启《滇志》卷九《曲靖府·科甲》(《续修四库全书》第681册,第535页),康熙《云南通志》卷一七《选举》(康熙刊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〇上《选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第4页),(明)李中溪纂修《隆庆云南通志》卷八《学校志第五·曲靖府·科目·进士》(民国二十三年龙氏重印本,第401页)。

⑯《万历二年会试录》(宁波出版社2007年影印天一阁藏本,第25页),《万历二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天一阁藏本,第47页),《南国贤书》(《金陵全书乙编·史料类》,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贡举考》(第522页),《类姓登科考》(第554页),崇祯《吴县志》卷三四《选举三·本朝进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8册,第18页),康熙《吴县志》卷五《进士》(康熙刊本)。

⑯万历《顺天府志》卷五《人物志·选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第200-201页),康熙《畿辅通志》卷一七《选举》(康熙二十二年刻本),雍正《畿辅通志》卷六一《选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5册,第465-466页)。

⑰考证详见《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流动研究》附录“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

⑱二人考证同见“明代北直隶迁入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分科名单表”。

⑲明代对户籍不属北直隶或南直隶的北、南两京国子监监生出身的进士,都是按其本来的户籍地(现籍地)确认其属地,而不认为其是北直隶或南直隶进士。

⑳详见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第89-100页)。

㉑由于史料缺失和笔者在搜检相关史料时可能存在的疏漏,“791人”应只是该类进士的一个最低统计数字;但也可以肯定,由于该数字是笔者根据对该类进士确认标准和尽可能全面占有相关史料基础上进行逐一确认、统计的结果,故应是目前最为接近实际的明代北直隶该类进士的统计数字。

㉒据笔者统计,该类进士占比最高的省份是贵州,达87.78%。

㉓刘明鑫《明代广东进士总数、时空分布及其成因考述》统计明代广东进士为858人(《暨南史学》2019年第2期)。

㉔依据“进士科举竞争力的形成或主要形成之地”标准进行考证和统计,明代云南、贵州、广西、辽东4省域进士分别为252人、90人、202人、64人,总共608人。

㉕该时期北直隶地区实际上经历了洪武、建文时期的北平布政司、永乐元年正月至十九年正月的“北京行部”和此后的北直隶三个时期,此处为行文方便,概以“北直隶”称之。

㉖详见正统四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天一阁藏本)、《会试录》(宁波出版社2007年影印天一阁藏本),(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三《赠主事章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67页),(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九《明宣义郎节庵章公墓表》(《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第5辑,第17册,第630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三五《选举十三·明举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第529页)。

㉗“时期”是指“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考中进士”的时期,而非指其“官至”时期;在某年号使用时间较短的时期(如建文、宣德、正统、景泰、天顺、隆庆、天启等时期)考中的进士,其“官至”往往要到下一个或两个时期才能确定;只有个别年号使用较长时间的时期,如嘉靖、万历时期,在其初年考中的进士,其“官至”与考中进士的时间应大致属于同一时期。

㉘“★”代表“明代外省直迁入北直隶移民及其后裔进士”。

③“阁臣”无固定官品。此8人中,高者,如徐珵(改名有贞,武功伯特进光禄大夫)、李东阳(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杨一清(特进左柱国)都官至正一品;低者,如魏藻德为“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官至正二品。

③“从一品”包括加少傅、少保和太子太保衔的尚书。

④“正二品”包括尚书和都御史。

⑤“从二品”指布政使。

⑥“正三品”包括侍郎、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应天府尹、按察使。

⑦“从三品”包括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布政司参政、行太仆寺卿、苑马寺卿、盐运司都转运使。

⑧“正四品”包括佥都御史、通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顺天府丞、按察副使、行太仆寺少卿、苑马寺少卿、知府。

⑨“从四品”包括国子监祭酒、布政司参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

⑩“正五品”包括郎中、通政司参议、大理寺丞、詹事府庶子、光禄寺少卿、尚宝司卿、王府长史、按察司佥事、府同知。

⑪“从五品”包括员外郎、詹事府谕德、司经局洗马、尚宝司少卿、盐运司都转运副使、知州。

⑫“正六品”包括主事、中允、太仆寺丞、尚宝司丞、江宁知县、通判。

⑬“从六品”包括修撰、鸿胪寺丞。

⑭“正七品”包括御史、大理寺评事、编修、国子监博士、太常寺博士、都给事中、推官、知县。

⑮“从七品”包括检讨、左右给事中、给事中、中书舍人、行人司司副。

⑯“正八品”指行人。

⑰详见明各朝《实录》、焦竑《献征录》、各省《通志·职官志》等文献,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注出。

⑱详见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学术月刊》2020年第12期)。

⑲据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统计,明代进士最多的三个府——南直隶苏州府、浙江绍兴府、江西吉安府,其进士数分别为894名、836名、820名(第69页、70页)。

⑳分别为徐珵(有贞)、李东阳、岳正、杨一清、曹元、翟銮、方从哲、朱国祚、冯铨、魏藻德。

[参考文献]

-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万历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第3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4]成化五年进士登科录[M].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 [5]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
- [6]正统四年进士登科录[M].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 [7](明)程敏政.篁墩文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8]万历二年进士登科录[M].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 [9]宣德五年进士登科录[M].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 [10]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M].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 [11](明)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 [12]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王立霞】